

的济良所多有赞美之词,称“所中办事,一秉致公。虽然并无熟友,既有公信前去,必定立时查办,决不置诸不理”云云。在清末问世的《九尾龟》,书名可能与上海俗语“久嫖成龟”有关。作者张春帆(1872~1935)塑造了凌辱私娼、有办法制服名妓婊子的才子加流氓章秋谷,也揭露了上海妓女界的四大金刚的手段和伎俩。鲁迅称该书为“嫖学百科全书”,胡适称之为“嫖界指南”。但张春帆一再声明,他写这本书的用意在“寓言醒世。……并不是闲着笔墨,旷着功夫,去做那嫖界的指南,花丛的历史。”(第33回)可以说《九尾龟》是清末狭邪小说中的“溢恶”代表作,“所写妓女都是坏人,狎客也像了无赖,与《海上花列传》又不同。”^①这种溢恶趋势的出现与当时社会时势的变异有着极大的关系。

第六目 济良所

“上海济良所发起于西历 1896 年,美国包慈贞女士来华传道,因见娼妓卖淫之可怜,即与同道西女五人集会祷告,共谋救济。是年耶稣诞日,女士游行虹口,见美国兵士多就草棚狎妓,于是创办济良所之志益决,与五人同志四出募捐。次年 10 月,赁西[熙]华德路(今长阳路)圣公会老牧师吴虹玉先生住宅为会所,收养迷路落魄及不愿为娼之女子。衣食教诲,颇著成效,华人闻之,多捐款相助。”^②

1901 年 包慈贞“鉴于沪市陷于罪恶中女孩为数颇广,亦有自幼失怙,擅自走迷,若不予以救济,则将永沦于惨痛之中”,^③在熙华德路正式发起成立上海济良所,专以救济不幸女子为唯

① 《鲁迅全集》卷九,第 339 页。

② 《济良所之历史与成绩》,《申报》1919 年 7 月 17 日。

③ 上海档案馆馆藏:《上海济良所发起组织理由书》,1946 年。

一目的。该所除了有西人参与,亦有华人的参与。光绪年间,严信厚等 13 人联名发出“济良分所募捐启”,说明原委:

“济良所设于[光绪]廿七年,救出沈沦苦海之妓女甚多,但僻在虹口师善里,知者尚少;且妓女出行,必有仆佣防备,无能远赴虹口。仆等因请济良所西董在四马路设立济良分所,专为收接不愿为娼妓女之处所。所有经费均由华人认筹。计自设立以来已收多人,需费日巨。仆等绵力,恐难久持。因念人之好善,谁不如我,特订捐册,广为劝募。且所中西董因收养日多,租屋不便,拟为集捐建屋。我等华人尤宜捐买地基,以表一本之谊。如蒙俯允,请书台衔、捐数如左。

济良所华董 严信厚、施则敬、朱佩珍、沈敦和、曾铸、周晋鏊、徐润、任锡汾、陈作霖、金清鏊、蔡德鏊、席裕福、汪龙标同启^①

该启事没有标注设立济良分所的确切时间。笔者在 1905 年 1 月 17 日《申报》上也查到一份“济良分所募捐启”。原文如下:

申报馆协振所谨告

虹口济良所专收妓女之受虐含冤从良莫遂者,欲施教诲一年之后,俟其性情纯淑,为之择婚,诚哉意美法良也。只以僻在虹口,妓女赴诉,殊多不便,所中耳目亦觉难周。现由华董严筱舫、朱葆珊、施子英、沈仲礼、徐雨之、任逢辛、周金箴、陈润夫、曾少乡、苏宝森、席子佩、汪汉溪诸君设分所于四马路,事当倡始,经费浩繁,伏祈海内绅商慨解仁囊,源源捐助,俾无数受虐含冤之女子得出火坑幸甚殆甚! 捐

^① 《旧上海的烟赌娼》图六,百家出版社 1988 年版。

款请交本馆协振所,随时掣奉收条。肃此布闻。伏祈慈鉴

这份启事还是没有解决上述问题。所幸《申报》1905年2月16日《严禁卖良为娼》一文提供了明确的答案:“西人设济良所于虹口,欲拯救被虐妓女而使之脱离火坑也。……所异者,设馆既远,赴诉之人颇属寥寥。经理女董包氏深虑地处偏僻,知之者少或虽知而为途甚遥不能赴诉,商同华绅于去冬腊月设分所于四马路。”因此可以认定严信厚等人设济良分所的时间不迟于1905年1月17日。

济良所最初在远离妓院区的上海东北部的西华德路上。位于虹口的妓院离它最近,是外国水手经常光顾的地方。一开始,很少有妓女主动前来寻求庇护。1902年,会审会廨和上海道台与委员会达成了一个协议,济良所可以领走被押来会审公廨的妓女,不过人数依然不多。

1905年,严信厚等士绅租下了福州路181号,建立起济良分所。次年,6名妓女一起结伴前来济良所寻求庇护,一群恶棍、老鸨以及另外一些地痞流氓聚到济良所门前,向所内投掷石块,“福州路差点儿被妓院老鸨们的怒火点着了”。情急之下,收容所的管理人员赶紧叫来了巡捕驱赶。事后巡捕房为了确保安全,还专门派了2名巡捕在这里看守了数日。^①

逃到济良所的妓女,不少人患有严重的性病,身体状况极差。济良所一般会将病情严重的妓女送进教会医院免费进行治疗。

随着收容的少女不断增多,西华德路的空间显然无法适应对少女们进行教育的工作。于是1907年济良所在浙江路华兴

① 《济良所年报》1934年第6页,转引自[法]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第3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坊租下了一块更大些的地方,将所有收容人员分别编入“首年部”和“工艺部”,分别进行管理。首年部收容将会待满一年的新来者,工艺部收容那些第一年过后没能离开而继续留下来的妇女。进工艺部的妇女,每天要进行一定时间的生产劳动。这些生产劳动虽然收入不多,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济良所财政上的困难。

济良所成立之初,大多数收容人员“是被巡捕抓来的”^①。1905年,警方就送来了33名妓女和9名婢女。会审公廨一般会将15岁以下的少女以及那些表示不愿再回妓院或想摆脱老鸨的妓女送到济良所来。在最初的5年内,在收容所大约140名妓女中,将近一半的人是由会审公廨送来的。

有时,济良所也会根据收到的匿名信而展开救援妓女的行动。这些匿名信大多是妓女在嫖客的帮助下发出的。济良所接到这类信件后,首先会请求警方做进一步的证实。1905年约有200宗这样的案例。

开初,济良所的工作人员很少,只有包慈贞、一名牧师和一名华籍办事员。1903年,明妮·莫里斯加盟。随着收容人员的不断增加,以及几个分部的相继建立,济良所开始招募工作人员。1905年时,共有工作人员15人。首年部住着数名传教士、2名教师、2名助手,还有1名技术指导。以后,住留教士不断增多,1909年有6名,1910年有7名,另有14名华籍助手。

济良所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捐款,而大多数捐款是不固定的。捐款占济良所总收入的50%至65%。其中1901年为93%;1902年为51%;1903年为61%;1904年为63%;1905年为81%;

① 《济良所年报》1904年第4页,转引自[法]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第378页。

1906年为33.5%；1910年为52%。^①在济良所成立后的头4年内，资助开设福州路济良分所的中国士绅共捐了1200至1700两银子，后来他们停止了资助。外国人的捐款则比中国人的多10倍。另外，上海会审公廨将一部分罚金拨给了济良所使用。工艺部收容人员的生产产品也是一定的资金来源，此外还有些其他收入如出租江湾分部的部分房屋的租金等。

收容人员的生活费用是济良所最大的开支。食品和衣物在预算中占的份额越来越大，1901年占0.3%，1908年以后平均占25%。^②中外工作人员的薪金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第六节 京津地区的妓女

第一目 北京

北京妓业在咸丰年间兴盛起来，“咸丰初年，有兰仙、竹仙、葱仙，一时名噪都下，朝绅争联轺诣之，金吾令亦少弛矣。”^③一时“妓风大炽，胭脂、石头等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为怪，身败名裂，且有因之褫官者”。^④

咸丰帝死后，通过北京政变上台执政的慈禧，于同治年间修订颁布了《大清律例》，一方面保留了嘉庆朝禁止买良为娼和禁止文武百官宿娼或娶娼的律例，另一方面删除了关于“京师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照例治罪”的内容，实际

① [法]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第391页。

② 同上，第376页。

③ 王韬：《燕台评春录》上。

④ 徐轸：《清稗类钞》第十一册，第5155页。